

史學三書新詮

「以史學理論為中心的比較研究」

林時民／著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林時民 著

史學三書新詮

——以史學理論為中心的比較研究

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

史學三書新詮：以史學理論為中心的比較研究

／林時民著．--初版．--臺北市：

臺灣學生，民86；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15-0841-1 (精裝)

ISBN 957-15-0842-X (平裝)

1.中國 - 史學

601

86010215

史學三書新詮

——以史學理論為中心的比較研究

著者：林時民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發行人：孫善書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〇〇二四六八八號

電話：二六二四一五六

傳真：一六三三三三四

本書局登：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記證字號

印刷所：宏輝彩色印刷公司

地址：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

電話：二二六八八五三

定價 精裝新臺幣四七〇元
平裝新臺幣四〇〇元

西元一九九七年九月初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15-0841-1 (精裝)

ISBN 957-15-0842-X (平裝)

63007

謹以本書獻給兩位恩師

李樹桐教授

李國祁教授

李序

在中國傳統的史學理論上，唐代劉知幾的史通、宋代鄭樵的通志、清代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是被視為三部經典之作，因此或稱之口史學三書。過去不少史家對三書多有討論，但將三者作一完整綜合比較性的研究，並寫成專書者，除張舜徽之史學三書平議外，似尚少其人。故林時民同學的此著在選題上，確有創新的立意，亦頗符合近年來國內博士論文選題的要求。故當初他以此作為其博士論文題目盼望我能擔任其論文指導時，我立即應允。

史學史或史學理論研究，在史學的領域中，是有相當難度的。特別是在今日人人崇尚西方現代史學理論研究，於中國傳統史學理論研究，更是如此。林君在讀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時，即有志於中國傳統史學理論研究，研究劉知幾的史通，博士班更擴大及將史學三書作完整的綜合比較研究，實是極為難能可貴的。亦頗符合碩士的研究是奠定研究基礎時期，博士的研究則是在此基礎上精益求精，以達於奠定其個人學術研究的重心所在。相較於時下一般讀研究所的同學，任意選題，亦任意改題，從不考慮學術研究的專注性與一貫性，高出甚多。而且其此一博士論文於取得博士後，一再修改，經歷四年之久的長期修改，方決定出版，可看出其治學的慎重與自我要求的嚴格。故林君是與時下功利是重的青年學者不同，他於治學有一以貫之的專業精神。

史學的研究，在理論上有兩大基本原則，一是求真，一是求通，就前者言，乃有個案研

究、專題研究，甚至斷代史的研究；就後者言，乃有觀變的研究，與找出歷史發展的規律的研究，以至於通史的著作。當前國內史學界的風氣，由於急功心切，每注重於前者，而忽略於後者，故專題個案研究成果甚多，而觀變求通的著作不足，乃遺見樹不見林之譏。不僅卷帙浩繁的通史巨著絕無僅有，甚至為人稱頌的斷代史之作亦甚少見。史學三書的作者，均極注重史學的求通求變，林君時民既治學專注，有一以貫之的精神，故僅盼其能本於此一精神，早日完成一部完整的綜合比較性的中國史學理論巨著，由上古直至當代，成其一家之言，則個人忝為其過去的論文指導，亦與有榮焉。

李國祁序於台北市興隆路寓所

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廿七日

序 言

筆者長期以來，即對史學史有份近乎固執的興趣，故能由《劉知幾史通之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持續研究，並擴大至本書《史學三書新詮——以史學理論為中心的比較研究》，其意義在於個人研究領域的拓展，已出一書一氏轉至三個不同時代的三書三氏，其內容所含蓋的時間範疇，也由李唐一代轉至幾乎已是整個中國近代以前之史學史，可謂至廣且久。若能研析周備，不啻太有助益於傳統史學。但一因筆者資材甚為愚驚，復受時程剋限，只得選擇三書三氏之中相關之史學理論部分，採行比較分析之法，聚萃以觀。或究同存異，或品評優劣，或道其長短，或去偽存真，皆置於史學史的背景及角度之下，審勢度理，期於三書之史學理論能闡幽發微，凸顯特色，建立相關系統，宏揚既有優良史學傳統。

撰寫本書草稿期間，辱承業師李國祁教授字字過目，賜正至多，備極辛勞，若拙著能粗備格式，老師厥功甚偉，最應感恩；邱老師添生亦指出不少訛謬，倍覺感幸；日本關西學院大學稻葉一郎教授慨贈有關三書日方資料，勉勵後學，不分國籍，更堪感佩。再者，家母幫帶稚女，讓筆者免為俗務勞絀；內人助我繕校，常於其教學、家務兩忙之餘，子夜為之，予筆者專心撰述。感懷之餘，只祈不負母恩與內助。

成稿之後，又蒙王德毅教授、王壽南教授、高明士教授針對拙作之根本錯誤，引述不

當、文字修飾缺失之處，多所指陳，諸先生皆本愛深責切、扶植後生之功德，予拙作重生之契機，實感銘無任，謹此拜謝。唯書中仍多不盡妥善，是以謹請大雅方家，不吝教正，至所企盼。

書中內容大多先後陸續發表在《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興大文史學報》、《興大歷史學報》及《中國書目季刊》等等國內學術刊物。並蒙國科會一九九三—四年度補助及荷承臺灣學生書局慨允梓行，筆者在此一併深謝。

一九九七丁丑年八月於國立中興大學雲平樓

目次

李序		I
序言		III
緒論		I
第一章「三書」作者的生平與其著作之關係比較		一一
第一節 早年：出身門風與近史宿性		一一
第二節 中年：仕宦交遊與基本性格		一九
第三節 晚年：著述志趣與懷才不遇		三四
小結		五〇
第二章「三書」之史學思想及其比較		五五
第一節 通識觀念		五五
第二節 批判精神		七三
第三節 懷疑精神		九四
第四節 進步史觀		一二〇
小結		一二二
第三章「三書」之史學理論及其比較		一五五
第一節 通史說		一五五
第二節 經世說		一七一

第三節 三長說	一九〇
---------	-----

第四節 史文說	二〇七
---------	-----

小 結	二二二
-----	-----

第四章「三書」之史學方法論及其比較

第一節 史料文獻學	二二六
-----------	-----

第二節 歷史編纂學	二六八
-----------	-----

第三節 校讎目錄學	三〇五
-----------	-----

第四節 方志學	三二六
---------	-----

小 結	三三九
-----	-----

第五章「三書」史學散論並比較

第一節 天命論	三四三
---------	-----

第二節 時局論	三五七
---------	-----

第三節 缺失論	三七二
---------	-----

第四節 影響論	四〇二
---------	-----

小 結	四一六
-----	-----

結 論	四一九
-----	-----

參引書目	四二七
------	-----

附錄：「三書」作者學行編年簡表	四五三
-----------------	-----

緒論

一、釋名：三書合併研究的緣由

唐代劉知幾的《史通》、宋代鄭樵的《通志》、清代章學誠的《文史通義》，被視為同組關係而排列哀輯在一起，合稱為史學「三書」，一如歷代所沿稱的「三通」「三史」「三傳」然，則是近代才有的事，清季以前，未聞如此。因而「三書」之名始於何時？本書何以據此名稱而加以系統研究，則殊饒意味，不能不一一說明之。考諸史傳，「三書」合舉，要推先於梁任公。任公曾云：

自有史學以來三千年間，得三人焉，在唐則劉知幾，其學說在《史通》；在宋則鄭樵，其學說在《通志·總序》及《藝文略》《校讎略》《圖譜略》；在清則章學誠，其學說在《文史通義》。^①

又：

①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附編篇》（台灣中華書局，民國六十二年，台三版），頁二十四。

中國史學的成立與發展，最有關係的有三個人：一、劉知幾、二、鄭樵、三、章學誠。……我們要研究中國史學的發展和成立，不能不研究此三人。^①

予「三書」極高的評價。惟任公雖舉稱三書，實際並未冠以「三書」之名，不過已略見機兆之先。之後，呂思勉在《史通評》亦云：

中國論作史之法，有特見者，當推劉知幾、鄭漁仲、章實齋三人。^②

更強調了任公的卓見。爾後，前輩學者張舜徽踵繼其武，在教授學生研讀《史通》《通志總序》《文史通義》時，間有疏記三書疑義，久之錄成一冊，取名《史學三書平議》^③。於焉

①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附補篇》，補篇第四章，丑，《史學史的做法》，頁一六一—一六二。

② 呂思勉，《史通評·自敘》（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年，台二版），頁五十五。另外，傅振倫，《中國三大史家思想之異同：劉知幾、鄭樵、章學誠》，《新農報副刊》，一九二八、十一、二十六—二十九。惜此文筆者迄今未見，但標題醒目。

③ 張舜徽，《史學三書平議》（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引言）：「往余啟導及門讀史，先之以《史通》《通志總序》《文史通義》三書，謂必關於前人評史之言，而後能考鏡源流，審辨高下。循序漸進，庶有以窺見治史門徑。諸生好學者，相從請質疑義，余一一答之，講習餘暇，間有疏記。凡三書中議論之精者，表而出之；其或疏舛，輒加考明；不護前人之短，期於求是而已。當時記諸書眉及行間上下皆滿，越歷多載，近始稍加芟治，錄為一冊，頗曰《史學三書平議》，固未能探得前人深處也。」，頁一。

「三書」之名始定，張氏遂為正式標舉「三書」名稱的第一人。

由於張氏所著該書於一九八三年始由北京中華書局梓印出版，年代可謂甚近，因而學界迄未普遍襲用此名，吾人可以審閱同年出版之《中國史學史辭典》，即未收錄「三書」一辭^①，以及遍查眾家史學史專著，亦似未見專論「三書」者可以明白。然假以時日，或可盛行，而轉化為專有名詞，為學者所樂於引用。蓋前已有任公登高一呼，首倡此議；繼有張氏專書，使用此名，或可漸成風氣。何況「三書」本身性質亦頗有類同，聚萃以觀，並無大礙。本書擬承襲梁任公、呂思勉、傅振倫、張舜徽之舊統，採用「三書」名稱，即意在薈萃眾說以觀類同，並比較指出其相異處，絕無標新立異，故創新詞以惑人。

再則，任公前面所指鄭樵重要學說在〈總序〉及〈藝文〉〈校讎〉〈圖譜〉諸略，並示人以讀諸略之次序與旨要^②。而張舜徽對鄭樵則僅稱其〈總序〉，未列諸略。表面觀之，兩人立意並非完全一致。然究其實際，兩氏皆執鄭樵學說要略加以申論，觀點立場並無不同。而本書為求其備，對鄭樵所著則略予擴充至各略乃至全書，蓋非如此即難以窺探鄭樵學理之大部。本書之主旨在將劉知幾、鄭樵、章學誠三人及其「三書」作一整體性的觀察比較，致

① 參吳澤、楊翼驥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史學史卷》（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八三），頁十四。是書未收「三書」條。

② 梁啟超，《國學研讀法三種》（台灣中華書局，民國六十四年，台八版），頁一一。

而在取材研討之範圍上，對三氏均採取較寬廣之立場，俾免有所疏漏。非獨對鄭樵一人如此，是事先要予以聲明的。

當然，前述梁任公、呂思勉、傅振倫、張舜徽諸位學者的啟迪之功不可沒之外，其他學者致力於對三書的部分研究成果，也是筆者樂於加入三書研究行列的重要依恃和憑藉。其中，就單獨對其中任何一書一氏而言，前人的研究成果，自唐末以來可謂汗牛充棟，書不勝書，可以不必列論；今人研究三書三氏者，除年譜及補正考察外，則多作比較研究，且大多劉章互比或作劉鄭、鄭章相較，惟後兩者較少；至於將「三書」或三氏合而比較者，則已寥寥可數。就目前所知在論文方面，似僅有蘇淵雷，〈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的史學成就及其異同（上、下）〉一文，在專著方面則亦似只有張舜徽《史學三書平議》一書而已。唯張書將「三書」分別討論，注重考索，兼有議論，屬於箋注性質，非整體性的比較研究。至於散論三書言論於個人專著之中，則可略見於甲凱《史學通論》、余英時《歷史與思想》、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附補篇》、吳天任《國史治要》等等諸書，皆是作者的偶發引論，雖不乏卓見，似亦猶未形成體系。於焉可知，「三書」三氏之整體比較研究，顯然仍有開拓的空間。本書著墨於三書合論，其重要原因俱在於此。

二、架構：研討方式與章節微旨

本書即以《史通》《通志》《文史通義》（含《校讎通義》）為經，時代背景為緯，採

行比較方法，整理劉、鄭、章三氏的史學思想、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論。希望在比較分析方法之下，三家史學得以顯現出其在中國史學史上的環帶意義。易言之即謂三家史學思想體系須透過比較法凸顯出來，並襯托出其在史學史上的意義。職準乎此，則有下列兩點，需略加說明：（一）書中之所以自始至終採取比較法為骨幹，主要原因即在於杜維運教授所說的：「不經過比較，無法看出每一種現象所具有的真正意義。歷史的變動性，將自此不可見，古今中外的溝通，也將因之而阻塞」^①。比較「三書」，究同存異，去偽存真，可以顯現「三

①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台北：華世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頁八七。范達人對比較史學的基本功能列有六點：（一）歷史的比較研究，是一種宏觀考察歷史的方法。這種方法可以克服研究歷史的狹隘性；（二）歷史的比較研究，是鮮明的很有說服力的方法，是研究歷史的一個角度；（三）歷史比較研究能起一種結合作用，促進歷史研究中理論與史料的科學統一；（四）歷史比較研究也包括歷史類比，而歷史類比方法，可以起到預見未來等作用。把類比的邏輯方法運用於歷史研究，運用這種方法要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五）歷史比較研究能在歷史研究中起一種驗證假設的作用；（六）歷史比較研究，有助於增進各國人民、各民族之間的相互了解，消除偏見、誤會等。詳氏，《當代比較史學論綱》，《史學理論》一九八九：二，頁一七一。另張玉法，《淺論比較歷史》，《歷史學新領域》（台北：聯經，民國六十七年），頁一三五—一四九，特別是三、範圍與方法，頁一三八—一四二。亦甚值得參考。

書」彼此的獨特性、依存性及其宏偉的學術氣象。「三書」雖然時代不同，但在史學史的背景下，仍可釐清、克服。史學史學者張孟倫曾說：

對歷史事實一件件地單獨去研究，是難看出什麼問題的。只有排列起來，抱著一種空虛「毋我」的態度，實事求是地經過嚴密的對比，精密的鑒別，同中求異，異中求同；偽裏找真，真裏找偽，並探索出其中的內部關聯之處，然後決定去取，用自己的語言高度地概括起來，也就釀成一種新的理論，建立了一種新的論點。^①

透過時間縱序的比較，同時運用分析和概括的方法，可以建立對「三書」的一種新理解。筆者深信比較法是通覽「三書」之後，更深入一層的研究所必經的，此法可以得到史學轉變的脈絡，亦可對「三書」乃至其他任何史書的進一步認識^②。

① 張孟倫，《中國史學史（上）》（甘肅：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頁二二。

② 顧立三，《左傳與國語之比較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七十二年），頁一九三。

雖然因為運用比較法，先天上即有其困難之處^①，亦因筆者材質質陋之故，但仍深願勉力旁採他法來輔助或克服比較法的不足^②，而終不計其收穫與成果。這一點是必須稍加詳說的。（二）書中引入《通志》併論列，或有史家以為性質不同於其他二書，而有異見。換

① 杜維運指出比較法有下列四種困境：（一）認識的困境、（二）附會的困境、（三）收穫不豐盛、

（四）過渡性的困境。詳參杜氏著，〈比較史學的困境〉，收於《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民國八十年）頁一一—一〇。范達人則謂歷史比較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至少表現在以下五點：（一）、成敗取決於指導它的歷史觀是否正確，它受運用此法者歷史觀的嚴重制約；（二）比較方法只適用於一定範圍，不是放之四海而皆行的；（三）任何比較都不會是十全十美的。它只能拿所比較事物或概念的一方面或幾個方面來相比，而暫時地和有條件地展開其他方面；（四）、不能把歷史比較方法孤立化、絕對化，它必須與其科學研究方法相配合；（五）比較容易產生牽強附會（此則引用杜維運老師之說）。詳見范氏，〈當代比較史學論綱〉，《史學理論》，一九八九：二，頁一七五。

② 其他方法如歷史考證法、歸納演繹法、綜合分析法、計量分析法、系統分析法，乃至共黨史學界常用之階級分析法都必須結合起來使用。語參范達人，〈當代比較史學論綱〉，《史學理論》一九八九：二，頁一七五。